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共建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陈晓峰 张其松

摘要: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的重要依托。立足于制度变迁一般规律和区域产业发展基本实践,聚焦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较好但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碎片化、同构化及资源错配等问题,主要从产业关联、空间再造、资源共享、园区合作、数字链接等维度探索集群共建的突破路径。考虑到集群共建是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具有多因素、多尺度、多主体等权变特征,需要突破一城一地内生性自我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亟待在政策联动、要素流动、创新协同、利益分享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并强化政策集成与叠加效应,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强大合力,进而为推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集群共建与区域协同治理提供实践范例和战略指引。

关键词: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区域一体化;合作共建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6—0048—08 收稿日期:2023—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跨界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21BJY1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22ZDA054)。

作者简介:陈晓峰,男,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产业创新发展研究所所长(南通 226009)。

张其松,男,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南通 226009)。

一、问题的提出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分工深化和集聚发展的高级形式,也是提升全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迎来央地密集部署、相关支持政策酝酿出台的窗口期,一些基础较好、特色明显的区域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成为稳链、强链并保持产业链韧性的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论,多数先进制造业集群距离世界级标准/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由于缺少较为成熟样板(经验)可参考借鉴,很多地方在培育和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过程中仍有“盲人摸象”般错觉。而且区域间缺乏分工协作与相互赋能,“各吹各号、各唱各调”现象比比皆

是,集群封闭性和排他性正日益显现。同时,中国转型时期较为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性体制导致数量庞大的各类开发区(高新区)在全国遍地开花,这种松散蔓延式的制造业布局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分散,显然不利于中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曾祥炎、成鹏飞,2019),也使得相关政策工具、要素流动、资源共享、利益补偿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制约瓶颈。有鉴于此,以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为指导、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有效空间载体实现集群共建,是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态和质量的重要抓手,有助于缓解区域产业发展碎片化、同构化等沉痾旧疾,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也是对产业跨界融合创新与区域协同治理的一次全新探索,更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的一次有益尝试。

对产业集群的认识最早源于19世纪末马歇尔提出的产业区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产业集群的阐释和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外部性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生命周期理论、竞争优势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集聚经济产生的原因与机理。一般认为,集群是地理临近、产业联系和行为主体互动合作三者的有机统一,其中,分工协作思想是产业集群的形成基础和核心动力。而且,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改善、生产和组织方式的柔性化变革,跨越地理边界城市网络外部性可能替代本地集聚经济的作用(Meijers, 2015)。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地方优势产业集群动态演进的高级阶段,一般具有世界性、先进性与集群性等核心特征(Andrew Crawley et al., 2012; Christian Ketel et al., 2014)。欧盟率先提出了世界级集群(全球型集群)的战略思想,并提出了3类15项的标准属性^①。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来,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在中国更是被冠以顶层设计的标签,战略导向不断明朗。国内学界也普遍认识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模式(陈晓峰, 2018),要从单个区域或城市的“孤军作战”转变为区域间和城市间的“协同作战”(杜宇玮, 2018),应超越以往地方集聚与竞争的本地产业集群建设模式,实现跨主体、跨组织、跨领域、跨区域的全方位网络化协作(赵作权等, 2018),推进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融合(梁琦, 2018),通过将单一地域的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扩展为多地域的产业集群网络,变集群内分工为集群间分工(陈柳, 2020)。产业趋同趋势下的分工协作是培育和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础,应基于动态要素禀赋优势,在长三角地区打造跨地区“协作型雁阵”(尹应凯等, 2022)。当前,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产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跨越行政边界连续集聚的新态势(邵朝对等, 2018),行政边界对产业空间的整合集聚作用将越来越模糊(王承云等, 2019)。一项基于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发现,跨界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吴松强等, 2021)。

二、长三角应在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长三角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交汇区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承担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使命,理应在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1. 集群共建是长三角所肩负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命

“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长三角在国内国际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关键的着力点是构建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自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规划政策体系“四梁八柱”初步构建,软硬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些跨行政区域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群有效互动实践层出不穷。但从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求来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创新策源力、价值链控制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差距或短板依旧明显。而且,囿于地方行政藩篱限制以及“为增长而竞争”等因素,尚未普遍形成自愿、稳定、互惠、可持续的区域集群分工协作体系。因此,合作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转变的关键所在。

2. 跨界共建符合世界级集群的发展规律与演进特征

美国硅谷的互联网经济和西雅图的航空产业集群,日本、德国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国台湾新竹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珠三角的深莞通信行业集群,上述集群的边界并不是以严格的地理边界为标志,而是基于科技创新资源的网络化共享与产业链整合协调所形成的(刘志彪等, 2022)。现阶段,单个区域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优势正逐渐弱化,仅靠其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是完全不够的。这也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承载能力有关,以大城市为中心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的城市群是具有更大规模、更强实力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础平台,有助于将集群跨界共建引入快车道。工信部组织开展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的45个优胜者名单中,跨区域集群有11个(含2个跨省域的)。从局部区域培育到跨区域探索实践,聚焦产业生态建“圈”组

“群”强“链”，整合集聚、跨界出圈、多维协同，成为未来促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3.长三角在集群共建方面具有现实基础与潜力空间

长三角产业体系完备、重点产业发达(见表1)，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中，长三角上市公司占比分别达41%、27%、45%、28%，与国内其他经济圈相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长三角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地标在诸多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世界级产能和集聚优势(王振，2020)。目前长三角已形成7个万亿级、3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并形成了“大集群+小集群”的产业发展

格局(见表2)，为区域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打下了坚实基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十大领域，强化区域优势产业协作，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022年联合颁布的《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均提出要共建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体系。长三角区域内部很多城市之间地缘相通、文脉同源、人缘相亲，拥有“互补”的产业集群发展生态和“互利”的历史发展脉络，在集群跨界共建方面“走在前、做示范”，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战略必要性。

表1 2021年长三角地区重点产业利润及与全国的比较 (单位:亿元)

产业类别	江苏	浙江	上海	安徽	长三角(合)	全国	占比
电子信息制造业	1147.58	680.24	181.14	247.16	2256.12	9018.57	0.2502
装备制造业	1442.14	830.05	462.25	186.59	2921.03	6479.07	0.4508
石化产业	1816.98	1622.88	609.26	403.97	4453.09	13482.3	0.3303
金属冶炼产业	767.39	252.6	138.9	208.16	1367.05	8158.44	0.1676
纺织服装产业	265.17	318.75	23.02	51.72	658.66	2230.26	0.2953
汽车制造业	460.39	520.06	594.34	95.46	1670.25	5646.29	0.2958
食品加工制造业	69.95	53.08	93.98	32.02	249.03	1738.87	0.1432
医药制造业	522.31	433.48	190.4	133.96	1280.15	6430.68	0.199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40.38	383.53	60.37	488	1272.28	6032.2	0.2109

资料来源: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统计年鉴(2022)。

表2 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建设的现实基础(优势)

区域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个数(2022年)	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个数(2022年)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集群个数(2021年)	中国百强产业集群个数(2023年)	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个数(2022年)
上海	3	4	4	5	2
江苏	10	11	3	18	18
浙江	4	2	3	17	8
安徽	1	3	3	7	8
长三角(合)	18	20	13	47	32
全国	45	108	66	100	177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主要短板

长三角地区在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还存在诸多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集群同质化竞争态势严重,产业链未形成纵深连接的协同优势

第一,集群同质化竞争比较明显。从江浙沪皖

各自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实施方案中可以发现,四地的重点发展产业雷同度较高,这种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压力将长期存在,容易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重复建设和资源分散,很难发挥整体联动性来合理布局区域产业链,集群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大打折扣。第二,产业链协同优势未能体现。即使有部分明星企业已是一枝独秀,但集群内其他配套企业未能很好地在各环节有效嵌入,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外溢效应无法在集群内得以有效

释放,在实施“链长制”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链主”尚未充分协调产业链上各节点的活动,难以发挥出整体产业链应有的聚合能力,有时还会面临产业链上游成本上升与逐步外迁的风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集群产业链的韧性及安全性。第三,集群产业生态体系有待优化。长三角早期的一些以单体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传统制造业集群,往往是集中于产业链中的某个特定环节,内部企业倾向于“各为其主”“单打独斗”,难以形成产业链整体合力。现阶段,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及建设过程中,同类企业横向集聚趋势明显,上下游企业联动作用不强,核心(龙头)企业、产业链配套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及国家安全信用评级等关键环节未实现有效协同,高质量集群产业生态体系打造道阻且长。

2. 科创资源存在结构性失衡,集群跨区域协同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第一,科创资源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极化格局。以上海、南京、合肥为代表的“科教名城”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已逐步抢占了产业创新制高点。与此同时,苏州、杭州、宁波等先天科教实力相对不足的经济强市,多年来则抓住与“大院大所”合作路径,积极补齐高端创新资源的“短板”。总体来看,上述核心大城市的创新资源(体系)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极化—外溢”效应,但在创新转化、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方面竞争激烈。第二,科创资源跨区域流动存在重重障碍。由于诸多城市间行政隶属关系复杂,科技创新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存在障碍,跨行政区域的产学研一体化格局尚未普遍形成。特别是各地区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认定存在不同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创新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浪费,也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第三,区域创新生态有待全面优化。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创新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使用现象,主要表现为“政产学研金用”各方始终不能形成有效闭环,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的融通协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企业间合作创新方面,多个创新主体共同申请专利的多为集团内部公司,企业之间合作并形成有效保护的较少。同时,跨地区、跨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企业联合创新中心还寥寥无几。

3. 产业联动性与政策协调度不够,集群之间尚未产生“化学反应”

第一,集群的产业/空间关联度不强。现有集群大都囿于一隅或限于一业,仍是以市、县这样的行政单元为主体,其中部分仍热衷于“大而全”发展模式。而且浙苏皖三地更多是面向上海接受辐射带动。部分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扩散、服务带动作用不够突出,与长江中上游省市的经济联系普遍较弱,部分优势集群大跨度构建生产网络的意愿不强。第二,集群的政策协调度明显不够,一方面,省市之间协调不够,地区部门和载体之间的协调也不够。当前职能部门推进集群工作的有效抓手不多,而且条块之间政策协调为集群赋能的管理机制亟待构建。另一方面,共建集群的协调度不够。部分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是两三个市联合推进(核心区+协作区),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且地域空间的产业组织结构松散,市与市之间明显缺乏互动协调。另外,由于省际“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集群分工合作普遍缺乏利益分成机制和适时退出渠道。第三,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比较单薄。产业领域的协调机制建设明显滞后,缺少公共服务重大平台来畅通集群企业间协作渠道。针对三省一市的跨区域产业基金相对欠缺,近年来成立的一些跨区域产业联盟所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各类集群发展促进机构基本局限在本地,跨区域一体化发展受限,其实质性抓手不多且作用相对有限。而且,各级地方政府在协调产业分工与协作事宜方面普遍存在畏难现象。

4. 要素自由流动遭遇行政壁垒,政府与市场亟待形成发展合力

第一,要素自由流动受限使得产业分工协作基础不牢。由于发展条件悬殊和本位主义桎梏,统一的要素市场还未真正建立,集群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在区内(际)流动并不顺畅,核心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或集聚趋势尤为明显,部分周边中小城市普遍面临着缺乏高技术人才和熟练产业工人的双重制约。部分制造业集群企业出于沉没成本和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等隐性成本考虑,跨区域转移或合作的意愿不强,容易形成发展空间格局的锁定。第二,地方性招商引资政策对区域分工形成新的障碍。各地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出台了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虽然优惠政策比拼

激发了区域活力,但也扭曲了资源配置。一些城市在做强做大的思维驱动下习惯于“跑马圈地”或“画地为牢”式发展,容易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同时,以都市圈为单元的分工合作能够突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但同时也会对要素自由流动、区域有效分工形成新的圈层壁垒。第三,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在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环境保护、安全监管、信用评价、知识产权等公共管理领域,各地执行的标准和程序是不一样的。同时,由于发展水平、利益诉求等差异,各地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信息沟通与获取不全面、信任破裂等问题,甚至会出现违背协议、不履行职责、破坏合作的行为。由于政策机制在关键环节存在“制度梗阻”,产业分工协作中较难形成约束强、权威高、能落地的决策。

四、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突破路径

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长三角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1.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有效促进产业链空间网络合理布局

第一,随着物流条件和营商环境的改善,长三角产业链空间格局具备了向其腹地进一步延伸的动力和条件,而原来那些仅仅具备生产(商务)成本优势的中小城市,可以承接中心城市那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配套项目,从而协助中心城市保持其产业链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同时,进一步建设中小城市链接中心城市的立体交通体系,降低物流及通勤成本,促进营商环境的全面接轨。第二,当前,对长三角优势集群应进行全面盘点和系统整合(目标聚焦),推进集群“瘦身”与“强身”计划,进而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元到上万亿元的全球产业链集群^②,并以产业链为纽带,通过策划“主配协同”活动,打造一批“专精特新”配套型企业,不断优化产业配套半径。第三,在“链长制”改革基础上,突破产业链协调的行政边界限制,建立跨区域产业链对接合作的平台载体、要素投入、政策配套等,构建集中连片、集约高效的一体化产业链空间梯度体系。拟实施的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

展基金要在集群共建方面充分发挥引导功能,平衡产业集聚区、相关企业等各方利益,并尝试在一些重点集群内率先探索跨区域共建的思路和方向。

2.打破行政地理边界,着力拓展集群共建的空间溢出效应

第一,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这一论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入现有先进制造业集群里,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当前应以集群融合为主攻方向,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交叉融合,打造形成未来能在全中国乃至全球具有行业话语权的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第二,基于产业关联、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信息互用、政策互通等标准,相关职能部门应联合遴选若干示范区域,并授予跨界共建集群相应称号,从而鼓励关联先进制造业集群之间形成高度网络化的互动与交流机制。同时,可考虑在地理毗邻地区(尤其是小尺度省际毗邻三角区域),以跨行政区的大集群为基本单元,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专业性市场及相关功能性支撑机构建设,有效推进集群跨区域整合发展。第三,借鉴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验,启动长三角各城市间联合开发运营。尤其应重视集群企业跨界经营产生的内生效应,鼓励区域内企业的并购活动,使得地区间的低水平产业竞争,转变为集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有效放大集群企业分工的市场一体化效应。在此过程中,应注重从过去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模式转变。

3.强化科技资源共享,全面赋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第一,激发中心城市创新溢出。上海作为重要的知识技术溢出地,应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向周边网络城市输出创新成果,为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高水平技术供给。应增强南京、杭州、合肥等区域中心城市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中心城市可以通过主动“走出去”(创新链扩散溢出)或积极“引进来”(共享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和综合配套优势),逐步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创新合作紧密度,缩小各节点城市间的创新合作水平差距。第二,促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合作互动,加强国家实验室、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布局,通过联合招标、“揭榜挂帅”等方式,

充分调动和有效整合长三角相关科创资源,逐步建立和完善跨行政界线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系,对“卡脖子”的重大科研任务和关键性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第三,培育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优质龙头企业,鼓励其通过资本、技术等纽带,跨区域建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并基于组织邻近、认知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多重优势,初步形成跨区域集群企业合作创新网络。同时,积极打造基于长三角优势产业集群与全球相应产业集聚区之间合作交流的跨国集群创新网络,不断提升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4.完善园区合作共建,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集群合作版图

第一,推进园区产业发展标准、环保标准、考评机制、信息/服务等标准化工作,统一准入门槛和服务细则,避免恶性竞争。推进毗邻园区、重点飞地深度对接,探索“圈层梯度、一区多园”及“园中园”等多种合作共建模式,推动园区的各类创新政策“跨区通兑”,引领、动员各类主体拓展多样化合作。第二,鼓励一流园区开展异地联合开发与联动发展,发挥其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孵化器、加速器作用。这方面可学习借鉴苏宿工业园区等典型合作共建园区经验,例如:始终把培育特色产业放在首要位置,依托产业转移方组织实施开发、建设、管理,并协商组建相对独立、具有开发区功能与权益的管理机构和具备市场运作主体功能、能进行独立投融资的开发主体,实施滚动开发。第三,当前飞地经济应当以科技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基于差异化分工形成集群间协作为主。企业应以提升竞争力为内在动力,通过地域分工与渠道共享建构起企业原驻地集群和飞地集群之间的网络联系。同时,有效发挥长三角开发区联盟作为社会中介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桥梁和守门员作用,将既有资源传导至飞地产业集群,实现两者间资源流动与双向升级。

5.抢抓数字经济红利,打造“东数西算”集群合作新样板

第一,以“数字长三角”“东数西算”为契机,推动长三角各地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加强存算基础设施与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深度融合。可在长三角优势产业链和特色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统筹布局建设一批高算力数据中心。同时,以国家或区域重大需求为牵引,创建数字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强化其对区域协同创新的辐射、引领和带动作用。第二,发挥江浙沪皖在数字经济方面的独特比较优势,以沪宁合、沪杭甬沿线的中心城市为核心,打造面向长三角的“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和跨区域物联网超级中试中心,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物联网应用高地。同时,结合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对象发展基础和优势,率先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虚拟化转型试点,提出依靠虚拟化平台推动合作的思路,鼓励相关龙头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价值链各环节在平台上的互联互通,实现多主体在虚拟空间的集聚与协作。第三,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全面释放其赋能作用,构建智慧物流新生态,打造数字化供应链服务体系,并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打造跨产业和突破企业边界的供应链生态圈,发挥工业互联网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串联作用,促进产业链各企业间信息互通、高效协同,培育形成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的创新态势,争创长三角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五、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还需政策引导和支持,建立多元联合推进机制,实现区域制度供给一体化,构建无差异的政策环境,健全府际协同治理机制,推动跨行政区治理进程,完善协同创新治理框架,打造区域性创新共同体。

1.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建立多元联合推进机制

第一,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下设产业集群合作专题组,强化集群建设的战略规划协同、指导政策协同以及配套服务协同,并坚持一张产业地图、一个实施方案、一组领导指挥、一个专家团队跟进、一套工作专班服务,集群跨界、跨越协作共建的战略方向、重大政策、重大举措、重大项目方面尽快形成协调机制并进行专项落实。其中,相应的集群发展促进机构应作为促进集群多边联系与互利合作的一个核心节点兼具国际化思维和全球化视野,在项目培育、集群遴选、市场开拓、动态追踪等方面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第二,借鉴上海等地编制产业地图的经验,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基础编制产业地图,并根据集群之间的资源整合共享、产业链配套编制专项发展规划,从稳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任

务出发,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集群内率先探索通过建立区域联动、部门联动、政策联动的推进机制,促进产业集群向专业化、高端化跃升。同时,应积极探索长三角一体化投资基金在集群合作中的引导功能和撬动作用,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创新集群跨界协作的制度安排。第三,充分调动中心城市引领集群共建的积极性,提升中心城市在高端要素集聚、高端价值链塑造、高端功能性攀升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形成层次分明、各具特色、功能完备、有机衔接的集群空间布局,并整合三省一市资源,加强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和跨区域横向联动,从全产业链视角建立多元协同、整体赋能、开放合作的集群联合建设及推进机制。

2. 实现区域制度供给一体化,构建无差异的政策环境

第一,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以一体化思路和举措深化长三角区域消费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及人才市场建设,取消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的各类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统一营商环境法规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推动资源整合和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第二,坚决破除本位主义的思维定式,以《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发展“十四五”规划》为基本遵循,重点在市场准入条件、综合监管体系、技术标准、资质认证、信用评价等方面形成一致性框架,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机制以及跨行政区管辖制度。同时,加快建立长三角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鼓励不同地区之间科技信息交流互动。第三,在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链联盟的基础上,加大集群联盟建设力度,在集群之间建立完善的分工合作机制、约束监督机制、利益驱动与共享补偿机制、信息沟通机制以及人才交流机制,积极降低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推进集群合作常态化,实现集群主体共赢和竞争力提升。同时,严惩各地区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设置企业跨区域经营或迁移障碍等行为,逐步消弭市场区域分割和市场碎片化带来的诸多弊端。

3. 健全府际协同治理机制,推动跨行政区治理进程

第一,由中央牵头或授权,建立三省一市跨行

政区域的地方政府合作组织。以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身份介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中,研究制定跨行政区产业统一发展规划和统一政策,明确三省一市在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的责任和义务,从立法上制订府际协同治理的权力来源、分配、边界等一系列规定。第二,鼓励地方探索集群跨区域协同培育发展机制,有效推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充当好集群“织网人”,在设备共享、展会展览、技术专利、人才培养、资金融通、公共活动、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同时,加快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成立由地方政府、产业联盟、企业、专家学者、社交媒体等多方代表参与的政府绩效考核委员会,而考核指标体系中不仅包含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还应包含跨行政区经济合作指标。第三,重视省际毗邻区域的协同治理(尤其小尺度跨界三角区域的先行先试)。可考虑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样板,复制推广其“机构法定、业界共治、市场运作”的新型跨域治理模式,并将这些已有探索运用到跨区域产业集群的合作中,制定跨区域集群的投资产出指标考核、土地资源共有的财税分享制度等,并允许相关经济指标在合作地区之间进行分解,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

4. 完善协同创新制度框架,打造区域性创新共同体

第一,遵循“不破行政隶属关系,打破行政边界约束”思路,由科技部牵头,会同三省一市共同建立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领导小组,在涉及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大规划、重大事项和重点工程上发挥统筹、协调和监督功能。同时,在省级层面建立联合研究机构、联合技术转让中心、联合科研基金、科技人才服务和技术评估等机构,负责解决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以及跨区域协同创新中的互利共赢问题。第二,创新产业大基金运营模式,探索出一条以领军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平台型协同创新网络治理模式。同时,进一步推广上海与苏州、嘉兴创新券通用通兑的实践经验,扩大试点领域,并统一科技创新券的服务标准、内容和平台,促进服务机构互认,建立网上注册、合同备案、创新券申领兑付一体化服务机制。第三,优化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政策,创新地方财政投入方式,完善跨区域科技创新指标体系及其监测评估、督察机制,从而提升

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更好地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学习借鉴长三角区域内的一些地市在上海设立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异地招才引智和研发孵化等科创资源利用模式,逐步建立基于“创新平台/资源”跨区域合作的投融资机制、成果(对接)转化机制、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以及社会保障统筹机制。

注释

①欧洲集群组织联合会(Europa Inter Cluster, 2010)发表欧洲世界级集群白皮书,从框架条件、集群成员与集群组织三方面阐明了世界级集群的九个特征。Bembenek等(2016)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使其特征(或标准)增加到15个。
②黄奇帆:《新冠疫情蔓延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思考》,《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2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曾祥炎,成鹏飞.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J].湖湘论坛,2019(4).
- [2]Meijers E. J.. Borrowed Size, Agglomeration Shadows and Cultural Amenities in North-West Europe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6).
- [3] Andrew Crawley, David Pickernel. An Appraisal of the European Cluster Observatory [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2, 2(19).
- [4] Christian Ketel, Sergiy Protsiv. European Cluster Panorama 2014 [R].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Competitiveness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2014.

- [5]陈晓峰.先行一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J].群众, 2018(2).
- [6]杜宇玮.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中国方案[J].国家治理, 2018(25).
- [7]赵作权,田园,赵璐.网络组织与世界级竞争力集群建设[J].区域经济评论, 2018(6).
- [8]梁琦.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和战略选择[J].国家治理, 2018(25).
- [9]陈柳.构建长三角跨区域的世界级产业集群[Z].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2020-12-02.
- [10]尹应凯,唐瑶琦.从产业趋同到产业集群: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 [11]邵朝对,苏丹妮,李坤望.跨越边界的集聚:空间特征与驱动因素[J].财贸经济, 2018(4).
- [12]王承云,马任东,王鑫.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嘉昆太”跨行政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研究[J].人文地理, 2019(5).
- [13]吴松强,尹航,蔡婷婷.嵌入性创新网络、跨界合作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J].华东经济管理, 2021(4).
- [14]刘志彪,凌永辉,孔令池.新发展格局下的长三角一体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22.
- [15]王振.长三角地区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推进路径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 [16]潘彪,黄征学.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于产业分工合作的视角[J].上海商学院学报, 2021(3).

Research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Joint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hen Xiaofeng Zhang Qisong

Abstract: Building a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achieve higher 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bravely become the pioneer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general law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basic practi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lust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ith good foundation but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a whole, fragmentation/isomorphism and resource mismatch in cluster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breakthrough path of cluster co-construc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space reconstruction, resource sharing, park cooperation, digital links, etc.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cess of cluster co-construction is an open and complex giant system with contingency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factors, multi-scale and multi agents, it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th dependence of endogenous self-development in one city, one plac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in policy linkage, factor flow,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etc. Strengthen policy integration & superposition effect, forming a strong synergy between effective markets and promising governments, then it will provide practical examples and strategic guidance for promoting cluster collabo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a larger space.

Key Words: World 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Co-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柳 阳)